日本古代散文“诗文融合”的叙事艺术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

黄建香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83–88 页

内容提要：史书、物语、日记等日本古代散文文学具有突出的诗文融合的现象，这种叙事艺术的产生受到中国古代散文的影响，其中成就最大的物语文学在唐代传奇文学的影响下一开始就选择了诗文融合的文体，并定传奇为基调，掀起了绵延数百年的物语潮，诞生了经典《源氏物语》。在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散文文学形成了使用假名文字、拥有女性作者群、展现“物哀”审美观等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特征。诗文融合体为提升日本古代散文的文学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日本文学　古代散文　诗文融合　比较

WATERBASED

“诗文融合”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产物，对此前人已经下过十分妥当的定义：“指在散文体小说的大结构中交织着诗歌体（包括诗、词、曲、赋等）的小段落，用以写景抒情或叙事状物。”[1]也就是散文作品中韵文和散文夹叙的叙事方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以韵律美、形式美、典雅美的审美艺术始终占据主流文学的地位，而《搜神记》等早期小说因在内容上以鬼神为题材、结构上粗陈梗概，被当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学，至于唐代传奇虽然故事生动感人、文采斐然，但也摆脱不了神怪意味浓厚和篇制短小的短板，与唐诗相比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直到四大名著相继诞生才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身份和地位。日本跟中国相比略有不同，古代日本对汉文和汉诗都十分尊崇，汉诗文的霸主地位直到和歌集《万叶集》的诞生才被打破，逐渐形成了汉诗文和假名文学并驾齐驱的格局，相对于中国的汉诗，日本的传统诗歌称为和歌，是假名文学，无论是“短歌”还是“俳句”均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而同样是假名文学的物语作品既没有汉诗文的权威性，又缺少和歌那样的艺术性，最关键的是大多由被排斥在学问和官僚世界之外的女性所创。所以，物语跟汉诗文以及和歌相比只能算是二流文学。[2]改变了物语作品命运甚至为古代散文树立了杰出榜样的是《源氏物语》，作为一部言情小说为“物语”体裁奠定了文学史上的地位，纵观古今，其对日本文学史的影响胜过和歌。《源氏物语》具有如此高的成就离不开诗文融合的行文形式，对作品文本的文体构建研究有助于探索经典的形成机理和散文文学的叙事艺术。

一、日本古代散文文学的诗文融合现象

日本的古代包括奈良时代（710-784）和平安时代（794-1185），这两个时代的散文文学诗文融合现象显著。现存的日本第一部文献同时也是第一部散文的《古事记》是神话，由汉字成就，正如《古今和歌集·真名序》所言：“逮于素戔乌尊、

1 郭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文融合传统》，《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第69页。
2 益田胜实、铃木日出男，《フィクションの誕生》，《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學燈社），1993年，第38卷第4期，第7页。原文是“能書家にとって物語創作というのは漢詩文や和歌に比べて「二流の文学」であったというのである”。

比较-正文.indd 83 17-12-14 下午4:14

到出云国，始有三十一之咏”，[1]《古事记》中须佐之男命（即素戋乌尊）迎娶栉名田比壳时吟诵的歌谣“八雲立つ出雲八重垣妻籠に八重垣作るその八重垣を”[2]是和歌的滥觞，“三十一”是短歌的音节数。随即还提到“其后虽天神之孙、海童之女、莫不以和歌通情者”，说明和歌具有男女之间表达爱意的“恋歌”的功能。《古事记》一共有110首歌谣，充分彰显了和歌的神权性，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后来的假名文字创作的和歌能够跃居主流文学的地位，也为散文类作品的叙事风格树立了方向标。内容与《古事记》多重叠、略晚问世的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的歌谣也多达130首。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部奈良时代最早、最主要的史书类散文文学俨然已经是成熟的诗文融合的作品，韵文和散文的水乳交融为史书锦上添花，赋予了史书文学价值。这两部史书在接受《史记》、《文选》等中国文学的过程中诞生，自然在叙事方法上受到中国散文文学的陶染。以《史记》为例，韵文十分醒目，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孔子的《去鲁歌》、司马相如《子虚赋》、赵王友歌、荆轲之《渡易水歌》等等枚不胜举，其中《垓下歌》、《去鲁歌》、赵王友歌等抒发离别或临终伤感的歌谣比较突出。司马迁不仅记录他人的韵文（如《曹相国世家》中的“萧何曹参之歌”），还引用他人的韵文（如屈原之楚辞），一些无法考证的韵文是作者自己创作的可能性也不可排除，《史记》的创作风格对体裁相近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树立了叙事的典范。

进入平安时代以后，包括物语、日记、随笔在内的散文文学在诗文融合方面都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脉相承。物语文学开始于平安时代初期，受到唐代传奇的影响，鼻祖《竹取物语》包括作者的姓名和性别、具体成书于平安初期的什么时候等尚存许多未解之谜，虽然篇幅短小，语言直白，但是赋予了大多数人物以和歌应酬的社交方式，说明物语伊始就选择了诗文融合的文体，并定传奇为基调。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有研究指出《竹取物语》的创作受到中国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3]的影响，[4]两者的内容和构思确实明显相似，但异同并存，最大的区别是《斑竹姑娘》并非诗文融合体。

诗文融合的散文作品一般以散文为主、韵文为辅，反其道而行的也有，《伊势物语》因以和歌为主而被称为“歌物语”，也因此被誉为反映贵族“雅”之精神核心的杰作。其第一话《初冠》结尾即点名全书的志趣：男子遇见心仪女子时赠上热情洋溢的和歌是风雅之举。[5]互赠和歌作为言情舞台必不可缺的礼仪符合和歌的一种主题——“恋爱”（另一种为“四季”）。此后，又相继诞生了同为“歌物语”的《大和物语》和《平中物语》等。

兼顾传奇和写实的《宇津保物语》和纯写实派的《落窪物语》克服了《竹取物语》和“歌物语”篇幅短小的不足，逐渐在长篇叙事中实现了诗文融合。

日本古代最杰出的写实主义长篇文学《源氏物语》在以上这些前人作品基础上应运而生，在叙事风格上实现了韵文和散文的完美结合，和歌数量达到795首，就数量最多的男主人公光源氏而言，221首和歌几乎攘括了其作为一名贵族的社交和私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谈情说爱的赠答歌、亲友之间的问候歌、内心独白的独咏歌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赠别、以歌怀念，诗文融合文学是贵族社会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源氏物语》之后平安时代末期的《堤中纳言物语》等在叙事风格方面延续了诗文融合的文体，但是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源氏物语》这座高峰前黯然失色。

1 纪友则、纪贯之等编撰，《古今和歌集》，佐伯梅友校注，岩波文库，1981年，第262页。本文中引用的“真名序”原文繁体字由笔者改为简化字。

2 荻原浅男校注，《古事记》，东京：小学馆，1983年，第44页。

3《斑竹姑娘》，见田海燕编著《金玉凤凰》，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

4 君岛久子，《チベットの『竹娘説話』と『竹取物語』》，《说话文学研究》，第6期，1972年。

5《伊势物语》，见片桐洋一等校注《竹取物语 伊势物语 大和物语 平中物语》（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东京：小学馆，1972年，第133-134页。

比较-正文.indd 84 17-12-14 下午4:14

《源氏物语》之前都是以言情为主题，其后诞生了多种类型的物语，有历史类（代表作《荣华物语》）、说话类（代表作《今昔物语》）、战记类（代表作《平家物语》）。说话类由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短篇故事构成，即使有的冠名“物语”，与传统物语也大相径庭，战记类是镰仓时代的产物，在这两类散文中韵文罕见，而言情类和历史类几乎都采用了诗文融合的叙事风格，特别要指出的是言情类故事都富有传奇色彩。

日本物语文学的崛起受到唐代传奇直接的影响，以上这些特点与唐代传奇有许多共鸣之处，影响力最大的当推张鷟（字文成）的《游仙窟》，该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恋爱小说的原型。张鷟文采斐然，笔底生花，才名远播，乃至“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1]新罗和日本的遣唐使争相求购其文章。《游仙窟》后来在中国失传，直到清代才回到本土，而日本人把其视作异书珍藏才得以流传至今。故事是从男主人公神仙窟遇到“女仙”开始的，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衣钵，又通过人物的非凡经历赋予了传奇色彩。绝艳的四六骈俪文无人能出其右，叙述部分采用韵文，对话部分则以男主人公“余”、十娘、五嫂三位人物时而谈笑风生、时而互咏诗歌的形式韵文和散文交错，是典型的韵散夹杂的文体，富有审美意蕴。因全篇充满浮艳之词，历史上对《游仙窟》的评价正如鲁迅在《〈游仙窟〉序言》总结的那样：“《游仙窟》为传奇，又多俳调，故史志皆不载”，[2]在古代素来受到官方排斥，但是其内容的传奇性和神怪性以及文体的诗文融合方法和同为唐初作品的《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等一起对以后的传奇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任氏传》的狐仙、《离魂记》的倩娘离魂、《柳毅传》的龙女、《李章武传》的人鬼恋等均是神怪为主题的作品。渐渐地发展出了多种类型的传奇，可以分为神怪类（代表作《南柯太守传》）、言情类（代表作《莺莺传》）、神怪言情复合类（《任氏传》）、侠义类（《红线》）、历史类（《东城老父传》）等，包含复合类在内，言情作品数量为冠。诗文融合的传奇作品除《游仙窟》以外主要有《柳氏传》、《李章武传》、《莺莺传》、《飞烟传》，以及宋代的《流红记》和《谭意哥传》，都是言情类或者神怪言情复合类的作品，因为言情是诗歌最常见的主题。诗文融合体中不仅男主角都是满腹经纶的士子，女主角也必须受过一定的教育，《游仙窟》的十娘是“清河崔公之末孙，适弘农杨府君之长子”，[3]出身高贵；《柳氏传》的柳氏“喜谈谑，善讴咏”；[4]《李章武传》的亡妇是良家女；《莺莺传》的崔莺莺生于贵族之家；《飞烟传》的步飞烟“善秦声，好文墨”。[5]也有像《任氏传》、《离魂记》等纯散文的言情传奇。历史类的《长恨传》和《王之涣》等也是诗文结合体，不足的是篇幅过短。隋末唐初的神怪类传奇《古镜记》中也有歌谣，狐仙化成的婢女鹦鹉临终时唱的歌谣在性质上和《史记》的临终伤感歌谣风格相似。

物语数量庞大，基本都继承了唐代传奇小说之言情、传奇、写实、文体等要素，但不是完全模仿，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唐代传奇作者都是男性，故事多发生在民间，男主角多为书生，女主角则形形色色，良家女、烟花巷柳或者人妻人妾都有，另一个特点是篇幅较短。而物语对传奇的接受是扬弃的过程，作者男女皆有，女性为主，自《竹取物语》起无不围绕上流社会展开，是贵族生活的写照，《伊势物语》、《大和物语》、《宇津保物语》、《落窪物语》、《源氏物语》、《浜松中纳言物语》……，不曾跳出王子公主的感情世界，字里行间流淌着雅致风流的情趣，以物语独特的视角在日本文学史上画出了一道浪漫和高雅格调的风景线。

日本的假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的，文学是在汉诗文的启发和推动下产生并发展的，对应于汉诗产生了和歌，对应于《史记》编撰了

1 刘昫编纂，《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31页。
2 鲁迅，《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5页。
3 张鷟，《游仙窟》，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14页。
4 许尧佐，《柳氏传》，见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2页。
5 皇甫枚，《飞烟传》，见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36页。

比较-正文.indd 85 17-12-14 下午4:14

《日本书纪》，参照唐代传奇发明了物语体裁，仿照汉文体的公文日记出现了假名日记。汉文日记（代表作《小右记》）是官方记录，属于男性统治的传统领域，具有史书性和“公”性，相较于此，假名日记为女性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可以偏离传统日记的形式，允许在记录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发表见解、抒发情怀，具有“私”性，文学价值并不逊色于物语，女性日记被称作女流日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样式。女流日记文学的诞生并非由女性创造，第一部假名日记文学《土佐日记》（935年）出自名叫纪贯之的才子之手，由于当时假名文章只有女性可写，因此作者起笔时特意伪装了性别，高调宣布自己是“女人”：“男人可以汉文写日记，身为女人也想尝试用假名写日记。”[1]纪贯之是和歌大家，参与了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的编撰工作，在日记中创作了很多应景的和歌，其后的女流日记作品《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等都是诗文融合文体。

至于随笔文学，《枕草子》是日本古代唯一一部，由才女清少纳言用假名所创，多处采用了诗文融合的创作手法，对后代的《方丈记》和《徒然草》等随笔影响深远。

物语、假名日记、随笔等散文文学在古代日本大放异彩，通过接受《史记》、唐代传奇等中国经典作品的诗文融合的创作方法使得散文作品既实现了具有可读性、内容性的长篇叙事结构，又保留了韵文的典雅风格。正如《古今和歌集·真名序》所言，和歌具有“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2]的魅力，“适为后世被知者，唯和歌之人而已”，[3]唯有歌人可以名垂千古。因此在散文中创作一定数量的和歌有助于提升作品的品质，这也是不能忽略的写作动机。

平安时代以后的物语作品一方面要面对《源氏物语》这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另一方面从摄关政治进入了武士专权的院政制时代，传统的言情物语的创作热情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物语”和“战记物语”，诗文融合传统亦渐渐迎来落幕。

二、诗文融合的成就与叙事艺术

在中国，诗歌的产生久远得无法追溯，上古歌谣是最早的文学样式，韵文历来受到推崇，是当仁不让的文学核心。《论语》、《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是早期的散文，虽然“在《左传》中，诗文融合的写作方法已经初露端倪”，[4]但是尚不成熟。《史记》是诗文融合的成功例子，这与诗歌的蓬勃发展不无关系，《诗经》的四言为主的歌谣之后，打破了四言结构的韵文形式相继诞生，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赋和乐府等是各时代典型的韵文代表，司马迁创作《史记》时吸收了这些韵文素材，并第一次在文献中提到楚辞（见《史记·酷吏列传》），在创作手法上“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5]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如此评价《史记》的影响力：“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6]《史记》之后，诗文融合在唐代传奇中再一次获得了提升，散文和韵文的结合更加完美，宋代赵彦卫对唐代传奇“文备众体”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唐代举人为了展示自己拥有“史才、诗笔、议论”[7]之才能，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唐代是中国诗歌文学的鼎盛期，兼收并蓄了汉代五言诗、六朝诗歌的精华，诗风推陈出新，诗人数量众多，留下了杰出的诗歌文化遗产。科举制度下的考试也采用创作诗赋形式，统治者都热衷于吟诗作赋，由此可见诗歌文学拥有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六朝之前出现

1 纪贯之，《土佐日记》，见《竹取物语 伊势物语 土佐日记》，东京：小学馆，1983年，原文是“男もすなる日記といふものを、女もしてみむとて、するなり”，第295页。
2 纪友则、纪贯之等编撰，《古今和歌集》，佐伯梅友校注，岩波文库，1981年，第262页。
3 纪友则、纪贯之等编撰，《古今和歌集》，佐伯梅友校注，岩波文库，1981年，第267页。
4 郭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文融合传统》，《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第69页。
5 王飞鸿、崔晟主编，《中国文学简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6 郑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页。
7 赵彦卫，《云麓漫钞》（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5页。

比较-正文.indd 86 17-12-14 下午4:14

了很多关于神仙方术的故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评价诸子十家时把这类题目中多带“说”字的作品（如《黄帝说》）分到“小说家”中，“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是“闾里小知者所及”、“刍荛狂夫之议也”，小说被视作小知，是乡野匹夫之谈，“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1]可见小说地位之低下。虽然六朝志怪小说数量庞大，也有上乘之作，但改观不大。六朝志怪小说的突出贡献是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此，在唐诗和前人小说地位悬殊的背景下，唐代传奇要想改变小说的命运就要设法创新，因此散文中引进韵文是必然的趋势。唐代传奇是在继承《史记》、诗歌文学、志怪小说等基础上的崭新起点，诗文融合体是传统婚恋诗和言情题材相结合的完美叙事手法，提升了小说的品味和文学性。

而受到唐代传奇直接影响的日本物语文学，面临相似又特殊的问题，在汉诗文与和歌霸占文学界的时代，物语这种新兴样式要争得一席之位需要契机，更何况是假名文章。物语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假名文字、言情、诗文融合作为初期物语的外延、上流阶层的生活为内涵。平安时代的和歌和散文都使用假名文字，诗文融合的散文感官上浑然一体，加上在当时推崇《游仙窟》等传奇作品的背景之下，诗文融合是必然的结果。作为和歌最常见主题的“恋歌”和言情故事的水乳交融，奠定了物语的艺术性和文学水准。

中国古代文学世界受男性文人统治，创作基本都是男性所为，女性文人凤毛麟角，唐代传奇的创作自然也都跟女性无缘，诗文融合体作品的男性作者都是能诗能文的名家，有很多人“学而优则仕”，凭藉文才仕进做官，《莺莺传》的作者元稹就是大诗人，其诗与白居易齐名，被世人合称“元白体”，官至节度使。诗文融合体的《昆仑奴》作者裴铏做过御史大夫。唐代小说名叫“传奇”大概就是从《莺莺传》的原题《传奇》和裴铏创作的同名小说集《传奇》而得。《柳氏传》的作者许尧佐任谏议大夫，文学大家皇甫枚除《飞烟传》外还留下了很多传奇作品，笔记小说集《本事诗》的作者孟棨是进士，其中《崔护》是诗文融合体传奇文学。可见作者才华横溢、阅历丰富是创作唐代传奇的条件保障，传奇文学也为文人们提供了发挥诗歌才华和传播诗作的舞台。

日本物语文学受到唐代传奇影响，但是异文化决定了物语的诸多特色。首先，物语作者大多是女性，这符合物语本来的“口承文学”形式，女性更擅长“讲故事”，遗憾的是人名可以确定的很少，事实上，由于女性的实名一般不允许公开，除了《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可以确定外其他物语作品的作者都众说纷纭，“紫式部”也并非真名，而是因为姓藤原，加上作者父亲在式部省担任“式部大丞”，入宫工作时便使用“藤式部”为“女房名”（即女官名），《源氏物语》流行后，不知不觉间后人开始取作品中的女主角名“紫”代替“藤”，便有了“紫式部”。其次，故事中人物有涵养、懂韵律，是因为作者具备很高的修养。女性作家们个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都接受过良好的汉诗文与和歌教育，都涉及和歌、物语、日记等多个领域的创作，紫式部作品除了《源氏物语》，还有《紫式部日记》和《紫式部集》（和歌集）；《更级日记》的作者菅原孝标女历来被看成是《浜松中纳言物语》和《寝觉物语》的可能作者；随笔文学《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还是有名的歌人，传下了《清少纳言集》；《蜻蛉日记》作者右大将道纲母在和歌创作方面也负有盛名，《小仓百人一首》选用了其和歌；平安时代中期和歌成就最大的歌人和泉式部是《和泉式部集》和《和泉式部日记》的作者；日记文学《成寻阿阇梨母集》的作者成寻阿阇梨母和《讚岐典侍日记》作者讚岐典侍都是歌人。由此可知，诗人（歌人）在散文创作中使用诗文融合手法的条件成熟，日本古代散文采用诗文融合体是必然所致。女性作家群比男性作家们的表现更加鲜艳夺目，为平安时代的王朝文学和女性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物语文学滥觞于《竹取物语》，其后在贵族社会掀起了物语潮。日本文学史上诗文融合体的

1 班固，《汉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774页。

比较-正文.indd 87 17-12-14 下午4:14

最高成就是《源氏物语》，是写实主义长篇小说杰作，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故事题材新颖别致、人物性格刻画独特、心理描写细致、文笔细腻、深入探究人性的本质、善用自然描写烘托人物心情和渲染故事氛围、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独特的“物哀”美学理念、散文和和歌及催马乐（一种古代歌谣）等韵文完美地融为一体、通过创作婚恋歌、离别歌、独白歌、挽歌等主题各异的和歌抒发了人物丰富的情感，等等，叙事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源氏物语》对人性的执着挖掘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而该书在成书起就名扬扶桑，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延续至今。日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文学都深受《源氏物语》的熏陶，川端文学中的“哀伤美”正是继承了《源氏物语》的“物哀观”。平安时代以后诗文融合传统只在《住吉物语》、《石清水物语》等少量拟古物语中得到继承，到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一种新型小说体裁“浮世草子”的兴起，诗文融合体结构逐渐解体，可以说伴随着物语文学的衰退，诗文融合体也渐渐落下了帷幕。从第一部物语《竹取物语》（平安时代初期）到《源氏物语》（约1010年）最多不超过220年，物语文学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达到鼎峰，不仅跟作家的个人天赋有关，还离不开言情类物语的积累，也离不开才女们在后宫这样的“女房”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担任女主人教育工作有关。

中国小说形式从魏晋时期的志怪类为主演变到唐代传奇时出现了神怪类、历史类、言情类等多种风格，此后各种类型并行发展、争奇斗艳，经过宋代的话本小说、元代的讲史小说，发展到明清的长篇小说，终于诞生了四大名著。神怪类的制高点是《西游记》，历史类的杰作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言情类诞生了《红楼梦》。《红楼梦》（创作于18世纪中叶）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是集语言魅力、传神的描写、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的社会批判性于一体的长篇巨著，文体上承袭了运用诗词歌赋的叙事传统，是诗文融合体的最高杰作，也是一座后人无法超越的巅峰。从唐代传奇大放异彩到《红楼梦》的诞生过了近千年的漫长岁月，比《源氏物语》也晚了七八百年，究其原因还是与言情小说不受重视的传统观念有关，四大名著中其他三部非言情小说的问世要早得多。《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是《源氏物语》没有尝试的方面。中国诗文融合体的旺盛期始于唐代传奇，《红楼梦》之后逐渐消退，可以认为中国散文文学中诗文融合现象的起落伴随着诗歌的繁荣和衰微。

三、结语

小说背负着传统的同时在不断的创新中获得生命和地位，诗文融合体是继承和革新、在艺术和生活中寻求平衡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其中唐代传奇文学的成就直接推动了物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日本古代散文文学无论是史书、物语还是日记无一例外采用诗文融合体，视其为一种写作准绳，这种叙事艺术是日本文学在自身文学荒芜的逆境中能够迅速崛起的一个原因。同时，日本古代散文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利用假名文字表达民族自身的文化思想，利用物语体裁讲述贵族阶层的现实生活，利用诗文融合体表现“雅”的精神实质和“物哀”的审美情趣。诗文融合体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足以显示民族审美心理特征的一个重要艺术传统”，[1]也是日本古代散文中体现该民族审美趣味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艺术。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最高成就《红楼梦》和《源氏物语》足以说明诗文融合叙事艺术的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1 郭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文融合传统》，《学术研究》，1997年第7期，第73页。

WATERBASED

比较-正文.indd 88 17-12-14 下午4:14